

## 释形义之源，考音声之变

### ——“2016 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工作坊”会议综述

近日，“2016 年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工作坊”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并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承办。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共提交论文 25 篇。会议旨在展示古文字与上古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探讨运用音韵变化规则考释古文字及分析出土文献语料的方法，促进古文字学与音韵学两个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会议首先由社科院语言所的郑张尚芳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冯蒸教授作开场报告。郑张先生的《初文同根同形分化字的音韵分型》通过考察词根古音，总结出了同形分化字的 5 种类型，为阐释其成因提供了新思路：①两字同根，音义相关但字形不相关（如“子—巳”）；②同根转注（如“立—位”、“益—溢”、“命—令”）；③第三类，借音转注，形义音相关，音出假借（如“才—在一裁”）；④借音增减音素，形音相关，假借音有增减（如“井—刑”、“两—丙”、“矢—寅”）；⑤异根、所象形似，音不相关但形义相关（如“小—少—沙”，“夕—月”）。

而冯蒸教授的报告《论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对〈说文〉及相关古文字的若干新考订》则高度肯定了《上古音系》的价值，并依次介绍了郑张的上古音系统以及他对汉字构造的新解及考订，举例说明《上古音系》中所采信的前人新说例及《说文》对形声字的解释，最后评介了郑张先生的“转注说”：①转注字就是具有字形分化关系的同源字；②转注字之间音义形皆同源；③转注字的构形方法主要包括加形符、加声符和变笔画 3 种；④其转注说系统严密，音理说明充分，堪称对文字学及词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其后，各与会代表所作的报告同样精彩纷呈、极具价值。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假设，又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既有音值构拟、音变阐释和语料运用的创见，又有字形考释、义理疏通和文本辑校的新解，并且都很注重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成果的相互补证。

上古音系及形态研究方面，东京成蹊大学野原将挥的《构拟“少”字音》将“少”的上古音构拟为\*ST-（\*stew?/-s），并且不跟心母“小”、明母“眇”谐声。华盛顿大学王弘治的《Some Examples Showing the Morphological Trace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通过考察动词和虚词的交替形式分析了甲骨文中所体现出的部分形态特征。厦门大学叶玉英的《从秦楚用字之异看复辅音在秦楚方言中的留存》认为楚简所反映的战国楚方言仍保留完备的复声符系统，而秦简则表明秦方言中的复辅音已几近殆尽。首都师范大学张富海的《上古汉语 -ps>-ts 音变在战国文字中的反映》举“蓋、廢、世、内、位、暨、摯”等七则战国文字中的

谐声通假例证,说明-ps>-ts 音变在战国时代已经发生。香港科技大学沈瑞清的《上古汉语的音系特点及其跟汉字产生的关系》基于弗斯音系理论重新分析上古汉语音系及其演化特点,提出了“汉语决定汉字论”假说。浙江财经大学边田钢的《牙喉音来源之以母的古音构拟》基于通假和异文材料及汉藏语关系词中的实例分析了牙喉音与以母通押的规律,并将牙喉音来源的以母构拟为\*ɦ-。上海大学郑妞的《“戴”字古音再考》认为“戴”字的上古音当是精母[tʂ],在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已音变成端母,通语中的“戴”字至晚到汉代也音变为端母。复旦大学施瑞峰的《上古汉语的 T-和 L-及相关的古文字问题补说》尝试将上古音声母中 T-系、L-系的区分落实到“采/秀/秃”、“戴/異”和“兆/涉/占”等具体的古文字现象上。

古文字考释及传世、出土文献语料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程少轩的《说马王堆帛书〈堪輿〉章用作“厌”的“庠”》认为马王堆帛书《堪輿》中用为“厌”的“庠”当看作“甲”声之楚文字的转写,与秦文字中的“庠”是同形字的关系。复旦大学张传官的《〈肩水金关汉简(伍)〉所见〈急就篇〉残简辑校》对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伍)》中的零散《急就篇》材料加以搜集、整理,并对照传世本进行了校勘。复旦大学谢明文的《曾伯克父甘姜簋铭文小考》根据《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新收录的两件曾伯克父簋,对器物铭文及相关金文和楚简资料作了进一步考释。华东师范大学黄人二的《上博简〈李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荀子·赋篇〉研究》对新出楚简《李颂》和《殷高宗问于三寿》进行了释读,并将它们与《荀子·赋篇》作了比较。华东师范大学王卉的《两汉金文异体字考释与研究》考察了两汉金文异体的类型、使用情况和形成原因,并将两汉金文异体字归为七类。华东师范大学曹洁的《〈王韵〉“一曰”刍论》指出《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中的术语“一曰”的主要作用是字义别说和一物二名,并体现了汉字字义的变化发展和一定的语义系统观。上海博物馆胡嘉麟的《蔡侯产剑戣戣释疑》将淮南蔡家岗赵家孤堆 M2 出土的蔡侯产剑中旧或释读为“畏爻”、“威教”的两个鸟篆铭文改释读为“鏗矛”。江苏师范大学刘洪涛的《〈说文〉“𣪠字”释义》指出,音于贵切之“𣪠”是“彙”字之讹,跟从“界”声之“𣪠”没有关系,后者上古不属匣母物部,而属帮母质部。中山大学蔡一峰的《出土文献疑难字“𣪠”字新探》讨论了楚文字“𣪠/一”的字词关系特例,认为上古楚语词“一”由于语言接触的特殊性而存在两读,并探讨了“楚方言”和“楚语”的概念。清华大学许可《试谈清华简〈系年〉改读一例》将清华简《系年》篇第五章末尾一个疑难字改释为从彪得声,读为“苞”,并将相应的短句改释读为“及苞于汝”。

古音研究中的语料辨析方面,中山大学范常喜的《上古音研究中所用出土语料辨析二则》指出楚文字“𣪠”无“月”义,金文“孀”无“母”和“成年女性美称通称”义,它们的上

古音价值须重新评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胡海琼的《出土文献古方音研究中材料使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为研究上古方音而选择出土文献语料时要注意时代和地域问题，重视方音特征的甄别及其与通语间音类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郑伟的《试谈上古汉语清鼻音构拟的语料问题》基于上古汉语的谐声系统、楚系出土文献、苗瑶及侗台语中的清鼻音声母字及闽南方言白读为擦音的鼻音声母字等语料探讨了上古清鼻音构拟的相关问题。

会议最后，上海师范大学的潘悟云教授作了题为《音韵学迎来新的春天》的报告。他首先回顾和比较了第一代与第二代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并强调当前第三代音韵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研究音变。为此，他以侗台语“稻”的音变链、汉语幽部\*u与泰语au的语音对应关系及以母的真时音变图为例，展示了研究音变的方法。最后，他指出第三代音韵学研究要充分利用数据库、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民族语与汉语方言等新材料，并融入现代语言学。

至此，2016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工作坊圆满落幕。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此次会议议题明确而集中，讨论热烈而充分，成果新颖而丰硕；并且，会议所倡导的学科交融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为促进古文字学和音韵学两个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张明辉 钟歆 廖宏艳(撰稿)